

上山下乡我在云南

沈志明 自述

一 文革中的农场见闻

我是1968年底去到西双版纳景洪县（现为景洪市）橄榄坝农场的，其时文革运动正如火如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推行“划线站队”的做法，主观地把全省名目繁多的造饭组织划分为“炮派”（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和“八派”（八二三无产阶级革命派）。两派势不两立，农场也是如此，而且解放军部队也多介入。随着“三支两军”部队的频繁更替，两派也不断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一派上台，另一派必定要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使其永世不得翻身，反之亦然。因此农场那时经常召开大规模的批斗大会，全场男女老少数千职工都聚集在场部，场部的巨型榕树独木成林遮天蔽日，绿荫下的批斗会也往往吵吵嚷嚷要开一天，上次提到的“痛打落水狗”的闹剧，就是在这样的会上不止一次地上演过。初来乍到的知青是局外人，但一开大会可以免除一天上山下田的繁重劳动，还能与四散各处的知青朋友名正言顺地聚在一起闲逛闲聊，为了对“抓革命”的正确态度，各队的司务长往往还会准备比平时更好的饭食送到会场，那时知青们常常在这儿享用难得的好饭食，逍遥一天。

我队有位湖南人叫陈敦杰，是“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中的坏分子。当年两派造反派走马灯似的轮番上台，无论彼此争斗得如何你死我活，他都在陪绑之列。有次批斗中，他被批斗得倒地不起，躺在泥地上口目紧闭，任人踢打。有人说他耍死狗，也有人担心出人命，一时不知如何收场。这时有个人站出来说能弄清他装不装假，说时迟那时快，一瓢粪便即刻凑到了坏分子的嘴边，尿尿恶臭，蛆虫翻涌，就在快要亲密接触时，坏分子下意识地争开眼睛翻转身去。出此下策的正是这个队的队长同志。队长是农业生产的一把好手，人精明能干，尔后在翻云覆雨的日子里也屡屡挨斗，可都不见他倒地过。

我们分场的副场长叫彭富旦，山西人，是个抗日老战士。他的腹部还留有三大盖的弹疤，在一次攻城战斗中与鬼子兵拼刺刀，他上手臂的肌肉挑脱了，瘪一大块。刚到农场那会儿，有知青还缠着他要看他的英雄疤，大家特别崇敬他。据说解放大军南下云南剿匪，他是边境上小有名气的侦察员，擒拿格斗都会一点，立有功劳。他管事那阵子难免得罪一些人，文革一来，他是当权派，就被人瞄上了。那天在景洪街头，来人故意找茬，诱他去偏僻处。老彭胆大自负，以为老子与鬼子和土匪军干过，怕你个鸟。不料一伙人蓄谋已久，把他堵在小屋里毒打了一顿，差点丧命。从此身强力壮的老彭身体垮了，几乎不能视事，在五十岁多时就不得不长期病休在家。病休的老彭其实并不闲着，隔三差五地担水送粪，伺弄他的菜园子，他说人不能光吃饭不劳动。当初我很不理解，何苦呢？现在想来，他的劳动本色其实很感人。

毛主席去世那年，老彭作为云南农垦的代表，以老八路的身份去北京瞻仰过领袖遗容。正式退休时（当时还没有离休一说）他回了山西老家，可老家地方太贫困，老革命也多，照顾不过来，人们都说老彭还不如在农场养老呢。

刚学干农活时，我生产组长叫刘秋林，一位来自湖南的支边农民。因为常年在天地间辛苦劳作，五十几岁的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得多，可他粗手大脚的，很壮实，一看便知道是把干农活的好手。第一次见面，老刘就自我介绍说，我是毛主席家乡来的。其实老刘不善言辞，每天带领我们上山劳动，只是带头干活，我们做得不好，再差他从来不数落一句，只会默默地帮你“擦屁股”，收工回来，我们的农具多半是他拾掇的。

老刘有个举止挺有趣，那年月，学习会批判会几乎天天有，每每此时，老刘都默默地提个小凳子坐在后面，无论会议如何的喧闹嘈杂，他都很安详，搓搓粗糙的大手，掏出土烟丝

卷他的喇叭烟，眯起双眼一支支地抽，直到散会。要知道，他卷烟用的纸，竟是毛主席语录本上撕下来的。那语录纸薄而精良，卷烟很顺手。天长日久老刘手里的“红宝书”只剩了一层皮，然而，早请示晚汇报，大手举着红皮神情依旧恭敬而虔诚。老刘生产劳动好，什么事非非也不搭理，评先进获奖励倒是常常有他，当年最好的奖赏就是毛主席的书，他大字不识几个，当然不会去细读，可他的卷烟纸却源源不断。老刘的出格举止绝对犯忌，要是别人，在当年是弥天大罪了，可他一直安然无事，这在我心里一直是个谜。后来新建五分场，老刘说我是毛主席家乡的人，就报名去了。开荒建场条件更加艰苦，可他又无反顾。他劳累一生死后便埋在五分场的山野里了。

当知青的第二年，队上来了位接受“劳动改造”的人，罪名依稀记得是“右派——右派言论”什么的。改造分子是云南人，正值盛年。他身材匀称而结实，剃个小平头，脸颊上的胡子刮得精光，微微泛着青，显得男子气。引人注目的是他额头上有块浅浅的胎记，这总让我想到《水浒》里贼配军烙的金印。

改造分子每天随大家出工收工，态度恭敬地“读语录”，听训话，除了劳动，几乎不说话。文革中，缄默也许是最好的护身符。即便如此，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总少不了他。有一次，他被冠以“伸进群众队伍里的黑手”的罪名，由我们几个知青押送他去会场。他的胸前照例挂个书上他罪名大牌子。此外造反派还要求我们用墨汁涂黑他的双手，以形象地表述其罪行。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与这位改造分子正面接触。他顺从地伸出双手让我们涂抹，我仔细端详，其实他的手长得挺好，五指修长而柔软，唯有手掌上层层叠叠的硬茧，表明他从事艰苦劳作已有些年头了。涂黑的手晾在阳光下油亮油亮的，倒像件艺术品，可那实实在在的为一个罪名准备的。

那次批判会后，我有点注意上他了，只是不便交往。我发现他干活很在行，尤其他的竹篾活值得称道。青竹在他手里剖削翻转，顷刻变成了一团团细细软软的篾子，尔后竹篾舞动，又成了图案好看的小扇小席，帽圈箩筐。他的锄头砍刀永远打磨得光亮洁净，破衣旧裤天天整洁如洗，出得门去，无论劳动还是挨斗，他都郑重得如同去赴一个约会。他一丝不苟地过着他的“贱民”生活，是真以为自己有罪错在认真改造，还是坚决而刻意地维护做人的起码尊严？在一次批斗会上，有人揭发他用外国话与妻子通信，是耍阴谋诡计。这倒使我们知青对他平添了几分敬仰，认定他是个有才有学的大知识分子。不久他被押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可惜他姓甚名谁我们都不知道，唯有那天阳光下一双油亮的黑手令人难忘。

二 迎接新知青

1969年至1971年间，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达到高潮。当时规定，凡是1968届和1969届的初高中毕业生要无条件去农村接受再教育，时称“一片红”。我于1969年9月被农场派往北京，上海迎接新知青。我们一行赶到北京，正值国庆20周年，那年我20岁。在北京我随工作小组在宣武区和东城区的一些学校做了几次宣传动员工作后就去了上海。在北京有件事说起来很可笑，当年动员去云南边疆，强调讲政治，多作正面宣传。可农场的艰苦生活干部们是心知肚明的，一到北京，他们便迫不及待地纷纷四处采购，招待所房间里一时挂满了香肠腌肉以及边疆难得见到的食品。当学生和家长找到我们住处打探情况，那宣传便露了马脚。在领导的严厉批评之后，当事人不得不把“抢购”来的东西统统塞到床底下，藏匿起来。

在我随上海的工作小组到上海嘉定南翔一带的学校巡回动员，接收报名去云南的新知青。是年底，在学校老师和工宣队师傅的协助下，我率先带着近千名新知青回到西双版纳橄榄坝。

此次出差上海有几件事值得一提，同去云南的知青中我是第一个再到上海的，许多家长闻讯都来探询情况，看到家长们急切的样子，我于是向母校培光中学借了会议室，开了个

座谈会。我是学校上山下乡积极分子，应学校邀请，我又向学校 69 届的同学汇报了我在云南边疆一年的情况。面临“一片红”的形势，学校又是标语口号，又是红旗锣鼓，搞得很隆重。两个会的直接成果是，我们第一批下乡云南知青中的弟妹有十来个人随我去了云南。如今难得聚会时大家还戏言当年我把他们骗去了云南。因为“一片红”，没有其它的选择，兄弟姐妹在一块家里好少些牵挂，做父母的也是用心良苦。

我带去云南的是上海嘉定南翔一带的学生，满满的一列车有近千人。在火车上勉强还能应付，哭哭闹闹，争争吵吵的，反正都在车厢里，并无大碍。到了昆明换乘卡车下西双版纳麻烦事就多了，大家挤在大卡车上连续四五天在满是尘土的盘山险路上前行，上车下车吃饭住宿忙个不停。学生们是第一次辞别父母远走他乡，情绪极不稳定。沿途的接待条件有限，大家只能睡地铺，吃的也不尽人意。有的地方还没通电，一到晚上黑灯瞎火的什么也看不见。有人想家一哭，哭声连成一片，就跑去卡车上擅自卸行李，说不走了，要回上海去。我们赶忙去安抚直到深夜，于是又耽搁了第二天的行程。这样队伍也就更加躁动不安，形成恶性循环。有时男学生间还会有肢体冲突，劝架也是件险事，我曾经因此被误伤导致眼底出血。总之一路上把我和学校老师、工宣队师傅累得筋疲力尽。由于坐的是卡车，还挂了装行李的拖斗，最担心的是安全。记得有个男生，在车子行进中隔着车篷布被路旁的树枝甩昏了，送昆明一查为严重脑震荡，留下了后遗症，不久被退回了上海。这位知青不在我带队的队伍里，可我在昆明知青接待站暂短工作时，他还在昆明接受治疗，我见过他。他圆脸大眼睛，嘴甜人也可爱，头缠绷带的那一刻，还调皮地冲你笑，一脸的稚气无忧无虑地就是个大孩子。

经过十来天的车马劳顿，新知青终于到了橄榄坝，我悬着的心才安定。不料领导宣布所到的知青全体归属水利兵团，有部队现役军人带领修水库。“不是说好来种橡胶的吗？我们受骗了……，我们要回上海去！”于是哭的哭，闹的闹，乱作一团。不断有学生围着带队老师、工宣队师傅以及工作小组的人要问个明白，结果情绪失控的学生把自己的老师乱揍一通了事。其实知青安置方案的变化，我也是刚刚听说，哪能怪老师呢。水利兵团归西双版纳州管辖，当年兵团下属有好几个团，橄榄坝的是水利三团。水利兵团仿效军队的管理方法以人海战术修建水库，在荒水野岭里，知青们开山炸石，送土垒坝，几乎没有机械设备，全凭体力。劳动强度极大，工伤事故迭出，忆及当年的苦战仍有人嘘唏不已。水利兵团的军人有的口碑不好，一是私生活不检点，绯闻不断，更有的与人争风吃醋，身绑炸药寻死觅活的。二是作风粗暴专横，与知青们关系很紧张。有知青后来告诉我，说他们风闻现役军人要撤回部队的消息，不少男知青已暗中串连好准备动粗出气，结果不知怎么的走漏了风声，军人们实际上是星夜仓皇溜走的。然而，军人们也有苦衷，那时他们长期缺失人性的关爱，以革命的名义压抑他们太久了。水利兵团解散后，知青们又归属已经恢复国营农场建制的橄榄坝农场，澜沧江边新建的八分场，成了他们的新家。由于仓促安置，八分场的条件异常的艰苦，面对再次置身茫茫无际的荒山野岭和漂泊不定的境遇，不少知青曾以“闹事”相抗争，有人甚至放火烧了栖身的茅草房，这是后话。知青们修建的水库地处橄榄坝的北端取名曼岭水库又是橄榄坝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发挥着作用当年《西双版纳报》还专门作过长篇报导。这多少让人感到点欣慰。

三 “十大”代表

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时云南农垦系统的一个代表由橄榄坝农场选派。代表条件是：女性；湖南支边老职工子女；生产一线的割胶工；曾被评先进者。这样我分场三队有个叫刘莲华的正好合适，被指定为代表。刘是割胶班的班长，胶割得好，产量也高，前不久场部的技术员还专程去蹲点总结经验，党支部正发展她入党。接到上级指示，分场党委立即行动，选举刘莲华为中共“十大”正式代表，上报省委。当时我在场部任宣传干事，参与过宣传刘莲华的工作。说实话，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姑

娘，刘莲华劳动积极，朴实肯干，是位农场的好职工，但要她去当代表确实牵强，也难为她了。她从小在边疆农村劳动生活，去北京开会，犹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都看不过来，更不要说党国大事了。她文化低，开会回来传达大会精神，连个文件也读不好。于是她就大讲特讲在北京坐电梯坐面包，在人民大会堂企图多拿会议用的铅笔留作纪念，怎么大着胆子想去拿伟大领袖烟灰缸里的烟灰等等。那时大家也无奈，任凭她胡说八道。当然，她对党和领袖的赤胆忠心无可置疑，只是愚诚得可爱。

因为刘莲华是“十大”代表，开会回来，农场给了个副场长的官，当然人们也不指望她能管多大的事，其实刘莲华当个生产组长挺好的，她可以继续做一个保有个本色的劳动者。后来传闻技术员欲树刘莲华为先进典型，其实别有它图。技术员丧偶多年，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过刘莲华搞大了，技术员的热情只得退潮。可刘莲华此时正在云里雾里罩着，有点找不到北。一度恋迷上一位相貌堂堂的上海知青，多次坐着场部领导唯一的小车去追所恋的人。那上海人也精，与她周旋，想借机换个如意的工作，直到知青大返城，这个故事才结束。

说到“十大”代表，我还想说说上海知青朱克家。朱克家不是我们农场的，他插队在爱尼人的寨子里，寨子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勐仑，叫做么等老寨。当年那儿远离县城，不通公路，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朱克家是主动请缨到么等老寨去当一名乡村教师的，他的工作得到了全寨上下一致好评，成为那时知青中的先进人物。“十大”召开，朱克家被选为代表，他那个代表条件也很有意思，即知青——上海知青——插队的——当教师的——有先进事迹。这样朱克家以云南省文教系统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席了“十大”，并被选为那一届的中央候补委员，回来后进了云南省领导班子。

据说在京与会时，江清邀请几位先进知青作客，朱克家也在座。四人帮倒台后，他被指责为四人帮在云南的骨干分子，批判受审，检查交代，据说最后又被送到一座煤矿上劳动改造，倍受磨难。如果说刘莲华少文化，只能“胡说八道”躲过了一劫，那么朱克家误入歧途，便在劫难逃了。然而洗尽铅华，朱克家仍是一位上山下乡去云南的上海知青。2000年我举家重返橄榄坝寻梦，听说朱克家曾经插队的寨子通了公路，还专程去了一趟。我们来到么等老寨时，一群孩子正在路边玩耍，问起朱克家，他们居然都知道。一个大点的叫阿就的孩子说：“朱克家还经常回来，他一回来寨子就会杀猪，象过节一样”。他还告诉我们朱克家在寨子里有个干妈，说着便带我们去见朱的干妈。干妈家竹楼的正房里端端正正地挂着两个镜框，朱克家夫妇的照片赫然在目，干妈得知我们从上海来，取下镜框让我们细察。有人介绍说朱克家常来看他干妈，干妈生日时还寄钱寄物来。我们问起朱克家离开寨子以后的事，干妈说“朱克家人好，在外面干大事……，他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么等老寨”。

四 婚曲忆旧

知识青年在西双版纳谈婚论嫁后，往往都回到父母身边去设宴完婚。小保小文（化名）是与我同去云南的上海知青，他们是第一对在农场完婚的知青恋人。婚宴就在橄榄坝农场一分场五队的“三忠室”，关于“三忠室”前文已经介绍过了。文革中农场的每个生产队都有这样的会议室。大家七手八脚地从老职工家抬来桌椅板凳，“三忠室”便成了婚庆的现场，当年讲的是革命化，没有婚纱婚曲，婚宴摆在“三忠室”似乎也是一种荣耀。新人们喜孜孜地在每张桌子上放上香蕉等热带水果，喜糖是景洪当地产的，包装简陋可甜味很纯正。主人还从傣族寨子买了芭蕉叶包裹的红塘块招待客人，土制的红塘块色浓味醇，真正的咬一口甜掉牙。酒宴摆上，满满当当的鸡鸭鱼肉俱全，当时物资匮乏生活艰苦，我心想搞得如此象模象样，真是难得，酒酣耳热之际，有人道出了那丰富菜肴的来历，原来是几个“捣蛋鬼”趁着朦胧的晨光，在老傣族赶摆（即每周一次的赶集）的路上强买强卖分头“扫荡”来的。据说当天他们所到之处，傣族老乡惊得大呼小叫，一个劲地骂：“国民党！你们国民党！”当

年国民党军败走云南边境，沿途惹祸，当地民众深恶痛绝，从此在傣族等百姓中，骂你国民党，是一句极其愤怒和严厉的话。“捣蛋鬼”出于义气，只想成人之美，其实他们的胡闹已大大出格了。但是知青在西双版纳结婚，被视为扎根边疆的革命行动，胡闹的事也没就被追究，至于老傣那儿事后如何摆平，也无人提起。

说了婚宴再说婚房，农场当年一度提倡“先生产后生活”，职工住的普遍是茅草房，仅见的土坯砖瓦房也是缺窗少门漏雨透风的，要结婚也没有婚房的讲究，两个铺盖卷一合，住到一起就成了。但也有知青讲究要有间婚房，我的朋友国平就是其中之一。西双版纳的傣家竹楼是风格独特的干栏式建筑，国平的婚房就是仿照了竹楼的穿榫方式构建的房子用 20 多公分见方的木材做立柱，在木柱的上下左右凿好大小各种榫眼，再用长短宽窄不同的木条串住榫眼，形成一个坚固平稳的房屋支架。墙由宽阔的毛竹片编排而成，茅草片覆顶。房子看上去与竹楼相似，只是没有架空面积小些而已。婚房建好，我去帮他糊墙纸，当然那墙纸不是如今那种，糊的是清一色收集来的“云南日报”。新房够土的，可家具挺新潮，国平很能干，会木工和油漆活。他的新房内床柜橱桌椅齐全，都是那些年最时兴的“调羹脚”款式。特别是那桌子是所谓的花篮台，其整体造型似花篮，四根弧形的木条优雅地托起上下大小两层台板，台板衬有花边木线条，曲线流畅，很别致。当时上海的家具凭结婚证登记，分批供应，多用纤维板杂木料，相比之下，这样的好家具很气派。

我和妻子都是下乡云南的上海知青，结婚生子都在西双版纳的橄榄坝。农场是个小社会，行政管理自成体系，一旦领导批准你们结婚，（当时也有不批准的，多半是所谓的政治原因，如一方家庭出身不好或本人政治表现有问题，通不过组织审查，有的在恋爱时就被干预散了）那日后一家大小的粮油棉，户口医疗都有了着落，领不领结婚证倒并不要紧。有些情爱甚笃的情侣。同居多年甚至有了孩子也不忙打结婚报告，他们留个单身的名分，也一天天做着回城的梦。我于 1976 年获准结婚，直到 1978 年底举家回迁上海时才想到去办个结婚证，因此我们结婚证上的日期并不是我实际的结婚时间。农场必竟不是政府职能部门，结婚证还得到政府部门去领。我们农场所属地区叫做：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勐罕区，文革中称景洪县勐罕区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记得那天下午，我持农场批准结婚的报告独自去办证，区政府一位傣族小伙子接待了我。小伙子短襟长裤，头戴一顶草绿色军帽，穿双黑皮鞋，那是当年傣家男青年最酷的打扮。我说明来意后，小伙子随手在抽屉里翻出两张空白的结婚证，笑嘻嘻地递给我说：“你自己填吧。”填完后，他看也不看就盖了公章，整个过程只几分钟。如今想起，我的结婚证象是自己开的。

五 探亲路上

下乡云南时，知青的探亲假每两年享受一次，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每次探亲，总让人又是欢喜又是愁。当年昆明至景洪往返的长途车班次很少，到了节假日更是一票难求。我的第一次探亲回上海正赶上 1971 年的“春运”，虽然当时还没有春运的提法，可路途的艰难不易之程度是一样的。我探亲假批下来时，已经买不到去昆明的车票了，只得在景洪街头四处拦卡车，央求卡车司机带我一程。云南的公路里程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物资往来出行办事全靠汽车。一路上汽车驾驶员在就餐住宿和购物等方面都有许多约定俗成的优待，那时的驾驶员个个都很神气，因此许多人宁愿握方向盘不愿当干部。当年搭车司机多半不敢收钱，乘坐长途客车一律在站点买票，凭票上车。当然给不给你搭车，全凭司机的一句话，一般情况下，除了熟人关系，女知青要占一些优势。你想，那开车的汉子出一回车几百上千里的路，几天几夜忙碌奔波，旁边有个青春活泼的女孩陪你说话解闷逗乐，那多好。有些手段的女青年每每探亲回来都会带点香烟零食什么的，她们一路上又是递烟又是剥糖哄得开车师傅乐不可支。自己带的大箱小包即省了托运费又省了气力，也少了搬上卸下的周折，师傅们一般也都心甘情愿地服务到位。即便如此，当年我几乎没有听说过有什么风流韵事发生。

我是混在一群景洪胶鞋厂职工里面，坐该厂的卡车到的昆明。我本文要提到的那个老波涛，其实他正带着一家老小要回湖南过年，他的儿子在胶鞋厂任职，与我朋友相称。此次搭车，有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我们乘坐的卡车虽是去昆明拉货的空车，可搭车人多，连人带行李早已拥挤不堪了。半路上来了位搭客，碍于司机的权威，大家也不好言语。上来的是一位中年男子，提了个小包，就在司机强行把他塞进人堆里时，他赶紧扶住车厢挡板，勉强稳住了身体。只见他讨好地向四周的人笑笑，想设法坐下来，可谁也不肯挪一下。过了一会儿，有人用打火机点烟，打火机是齿轮磨擦火石点燃渗着汽油的棉线着火的，可火石大概磨完了，火无法点着，点烟人很丧气。中年男子见状眼睛一亮，忙不迭地从小包里拿出来米粒样的火石递上去说：“我有火石，送你，送你。”点烟人迟疑了一下接过火石安上打火机重新打火，烟点着了，他吐了口，回望了一眼中年人，挪了挪身子说：“你站过来点吧。”又有人擦火点烟了，中年人再次掏出火石递过去说：“也送你，备着用。”接着他干脆把剩下的全送了人。这时，不知谁先说了一句：“大家挤一挤吧，站到昆明怎么行。”“是啊，都挤挤吧，出门在外都不容易。”有人也附言道。一会儿，竟腾出了一个空位，中年人便舒舒坦坦地坐了下来。我一瞧，他的坐位比我们都好。云南抽烟的人多，烟民们人手一个打火机耐磨的火石很便宜几分钱的事，可就是买不到，现在中年人三颗五颗地送，他们全乐了。中年人上海口音自称是一个农场知青慰问团的，他搭车如何搞定司机我不得而知，可那火石的“贿赂”却有一功。他摸准行情，有备而来，察颜观色，以最低的成本谋事成功，比女知青们棋高一着。

还是说那次探亲，我到了昆明，昆明火车站人山人海，回沪的火车票早已售罄，无奈我只得买张站台票先上车再说。车厢里人满为患，连行李架上和厕所外都是人，拥挤和混乱的程度如同文革中的大串连。举个例子说，如果你要上厕所，必须提前一个多小时开始朝目标挪动，否则内急一起，非出洋相不可，这样一来一回就是三个来小时。由于拥挤列车上的服务工作已经无法开展，一到大站，列车员把盒饭装在麻袋里从窗口塞进来大家分，又到站了，列车员又塞进条空麻袋。人们谁也不愿把油腻腻脏脏兮兮的麻袋放在自己仅有的空间，于是纷纷把自己那份空盒丢进空袋往前送。如此往复，饭也送了，盒也收了，那列车员真是绝顶的聪明。当年也不见谁白吃了不付钱，或者把空饭盒往窗外扔的，都说那时的人老实守规矩，也许是吧。昆明往返上海，单程为 56 小时，那次超员误点走了 70 多小时，我仗着年轻，居然一直站到上海，现在想来都不可想象。

知识青年回去探亲，依据粮食定量和准假天数，可得到几十斤全国粮票。那时，小干部们因公出差兑点云南粮票往往要赔进仅有的食油副食品的配额，老傣们去集贸市场或县城吃碗米干米线（一种米粉做的点心），没有粮票，只能身背相应的大米去换吃，偶尔一见的糕点饼干更是与他们无缘，夸张点讲，当地人有几张全国粮票，如同改革开放初期上海人凭借关系拥有点侨汇券港币那样令人羡慕。全国粮票那时是俏手货，也是探亲路上的硬通货，你可以用它与沿路的少数民族悄悄地换吃换喝，不需要再花钱。

有一年，我上海的父母得知我正在版纳筹划婚事，便托结束了探亲的知青朋友小龚带台缝纫机给我，不料龚不知怎么没有伺候好搭车的司机师傅，连人带行李被甩在半路上。前不着村的后不着店的，他望着一大堆行李束手无策。这时见正好有人经过，情急之下他想到身上还有全国粮票，便慌忙 3 斤 5 斤地递上去请求帮助，几个原本神情木然的山民见状象得了便宜似的，高高兴兴地扛起行李把龚送到了附近一个汽车站。事后龚感叹道：“要不是那几张全国粮票，你那宝贝缝纫机也完了。”要知道当年缝纫机是大件，是凭票供应的紧俏商品。我最后离开云南路经墨江时，还用全国粮票与一位爱尼小伙子换了把别致的民族小刀，用钱买反而不成。那小刀我至今仍保藏着，成了一个念想。

六 知青生活杂记

一碗红烧肉：傣家人称老大爷叫“老波涛”，我认识的老波涛其时年纪并不大，才五十多岁，他叫李增春，支边来云南的湖南醴陵人，他个不高，背微微有些驼。最令人难忘的是他那张布满褶子的脸，终日笑咪咪的，惹得皱纹都错落有致地舒展着，如同秋日里绽放的菊花。他的慈祥 and 亲切总让人想到大肚弥勒佛欢乐的样子，因此不少知青都喜欢到他家凑热闹打牙祭。那时生活艰苦，在老俩口眼里，我们这些小年轻都还是些需要倍加呵护的孩子。

有一年，因营养不良再加上劳累，我和不少人一样得了肝炎。记得是个中秋节，我有气无力地躺在床上休息，很孤单也很无助。这时老波涛乐呵呵地推门进来看我，他端来了一碗别具湖南风味的红烧肉。那年月一年难得见几回荤，这碗红烧肉恐怕搭进了老波涛一家节日里的大部分油水。诱人的肉香弥漫在小屋里，而我鼻腔的酸楚胜过了口舌的涎，只差没有掉泪。我不禁想起三年自然灾害时，为了让我们兄妹几个稍能裹腹，可怜的母亲常年以薄糊菜皮充饥的情景。多年前的一个冬日我告别上海来云南时，一大早上母亲特地为我煮了一大碗鸡汤面，肥嫩的鸡肉堆在面上，她默默地看着我吃，不说一句话。家境不好，母亲养鸡是为全家过年预备的唯一佳肴。我望着老波涛心想，此时老波涛的一家一定又在和着苦涩的咸菜霉豆鼓下饭了。如果说那破天荒的早餐我独享肥鸡，是我奔赴南疆时的一个盛宴，那么即使我能尝尽山珍海味，那碗红烧肉是我平生最鲜美最奢侈的一餐。

满月酒：儿子于 1977 年 12 月 21 日生在西双版纳橄榄坝，这正是我下乡的第九个年头。那时大多数知青都还没结婚，知青的孩子自然倍受宠爱，朋友们都怂恿我要为儿子办满月酒。当时我正在一所学校教书，便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用课桌拼了个大台子，围上椅子。场地到是有了，可吃什么呢，我挺犯愁。妻子怀孕后，我饲养了一窝鸡，不料遇上鸡瘟几乎死绝，那不断瘟倒的鸡便成了她孕期里主要的营养品，抗过鸡瘟的那两只鸡还指望它们下蛋呢，如今恐怕也小命不保了。

那天一早，有知青朋友就来帮忙张罗，他们在我住的屋边用土坯支了个灶，动手把那仅剩下的鸡杀了煮上。上海带去的咸肉挂在屋角一直舍不得吃，此时取下来一看已有蛆虫了，可朋友们说这是肉芽，照样好吃。咸肉洗了，剔除蛆虫也下锅煮上。此外还零零碎碎地弄了几把苦菜，卷心菜等。傍晚时分，客人陆续到了，有学生还去傣族寨子买了些香蕉等水果送来。点上烟，倒上酒，满满一桌人几个菜，满月酒就这样吃开了。此时，满了月的儿子新剃了个头，脑袋亮亮地正躺在一只竹编的摇篮里，摇篮的绳索栓在教室的房梁上，被人一推孩子晃悠悠的睡得很香甜。几杯酒下肚，大家七嘴八舌地纷纷为孩子祝福，也憧憬着他们每一个人的明天。菜终究不够吃，我急得把家里唯一能吃的几斤卷面和着盐水下了，装在脸盆里端上桌，好在朋友们不嫌弃，一扫而光作乐如常。后来我带着已长大成人的儿子去橄榄坝小住，人们还记得这顿寒酸的满月酒，他们对他说：“记住！你是橄榄坝人。”

坟地惊魂：这是一位知青朋友初到橄榄坝时遇到的事，那天他随老职工去生产队附近的山上选伐盖茅草房用的树叉。清晨的山里浓雾弥漫，参天的大树，密密匝匝的灌木林，蓬蓬勃勃的竹丛和遍地散开的飞机草，都湿漉漉地裹在雾里，不久他于是迷失了方向也找不到同伴。直到太阳升起，那透过枝叶洒进山林的阳光，似闪烁的媚眼，在不断升腾的雾气中盯着他，他焦急万分。当他终于转到一个高处时，举目四望虽不见生产队的房舍，却惊喜地发现老傣族寨子不远的山坡上有人撑伞坐着休息。于是他赶紧翻过山梁，兴冲冲地前去问路。

走近了，他看清了那撑伞男子黑衣黑裤，一双大脚裸露着，脸正埋在黑伞里。他轻轻走过去，见那人还没有什么反应，便去晃那伞。正欲打招呼，不料那伞突然滑落下来，一张毫无表情死寂的脸呈现在他眼前，竟然是位死者，他大惊失色。再一望，附近还有几个东倒西歪的人，于是他拔腿就跑，直到跑得气喘嘘嘘。回望来处，但见坡地上林木稀疏，红土衬着的黑伞人格外抢眼，显然这是亡者的安息之地。久闻当地有被遗弃的麻疯病人，人称“琵琶

甓鬼”，想到此他再也不敢逗留，又飞奔起来。傣族信奉佛教，世代以土葬为主，非正常死亡的称为“凶死”，入葬虽不讲究，也非他所遇见的那样。这难道是特殊岁月里一个难以入俗的凶死者？

布朗山寨行：为了鼓励知青扎根农村，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受命编辑了一套“青年自学丛书”，丛书文理兼备共有十几册。同时，又抽调高校教师到各地培训学习骨干，那次我有幸被选中参加培训学习，并随上海来的老师到布朗寨采访。所以选择去布朗山寨，是因为山寨有个英雄民兵排，他们在建国初期的剿匪作战中建立过战功，受到过中央军委的表彰，一度名闻遐迩。我们由一位布朗小伙子向导，慕名前往。小伙子也是民兵，-挎着枪在前面带路，他赤足行进，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可我们跟着他钻雨林爬大山累的够呛。直到下午才气喘嘘嘘地赶到布朗山寨。

布朗人的竹楼与傣族相仿，楼上住人，楼下圈牲畜堆杂物，屋内几无陈设，比傣族人简陋得多。屋中央终年不熄的火塘是布朗人的生活中心，他们在此煮食就餐，待客聊天，取暖安睡。当时山寨不通公路，只是难得通邮。人们一辈子不出大山，去过一趟县城就算很荣耀了，听说我们从上海来，如同见到天外来客样的好奇。山寨是国家免费医疗区，因缺医少药，时有不测，我们到时，一场瘟疫刚刚平息，吓得我们战战兢兢的不敢随便吃老乡的东西。我们找了一只锅，在山坡下的小溪里又擦又洗，每天煮些新鲜的蔬菜和活鸡吃。夜晚无奈只得借宿布朗人的竹楼，所垫所盖的被褥如运动垫子般又硬又厚，油黑发亮，气味很重，已经看不出棉布的本色了。我们睡在火塘边，被子不敢近口鼻。火塘里火苗闪烁，塘前悬挂着不知名的野味，在烟熏火燎中散发出奇异的香味，也令人疑惧。当年的布朗山寨，尽管山高路远也是人民公社体制，“农业学大寨”的标语赫然在目。队长领我们进会议室，室内布置竟与内地接轨，除了锦旗奖状外，最显眼的还是毛主席的彩色画像和“敬祝”之类的大字。队长是位复员军人，粗通汉语。他简要地介绍了情况后，便陪我们去边防哨所参观。据了解，云南的部队建有民族支队，由应征入伍的当地各族青年组成。他们对边疆的山水草木，习俗风情都了如指掌，由他们来守卫南疆国门，自然是最合适不过了。我们来得巧，正好军区电影放映队来放电影，这地方，半年才放一回电影，虽然片子老掉了牙，还是很受欢迎。在空地上，人们正在埋桩架杆支起一块银幕。这儿每次放电影都是一连好几天。看着大家兴高采烈的样子，除了一身绿军装，谁又分得清那是军那是民呢？

在山寨，我们意外地遇见了一对在此任教多年的昆明夫妇，他们是汉人，也是这一带仅有的知识分子。其实教学生早已不是他们唯一的工作，因为闭塞和文化落后，他们还要讲读各级政府部门下发的文件，且以他们对文件的理解为权威解释，就连生病吃药人们也常请他们顾问，遇到难事，山民们亦都乐于向他们问计。在山寨，夫妇俩倍受尊重。看来他们一生的光阴大概命中注定似的要消融在布朗山寨了。

七 返城潮及其我

林彪事件之后不久，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据文件传达，林彪有个 571 工程纪要，571 即武装起义的谐音。在这个纪要中，有一条称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当年的上山下乡被誉为新生事物，是消灭三大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重要举措，鼓励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一辈子。在农场召开的批林批孔干部会上，有上海知青摇旗呐喊，表示坚决扎根边疆的决心，同时策划了一份“告全场知识青年书”张贴于会场并征集签名。结果与会的十六名上海知青签了名，我也在其中。此份“告全场知识青年书”提出了一个很独特的口号叫做：橄榄坝不建设好，请我们走也不走。这一行动，成了农场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先进事迹，策划者很快受到领导们的赏识。上海驻橄榄坝农场知识青年慰问团，不失时机将此“告全场知识青年书”推荐给了上海的《上山

下乡》刊物，刊物予以全文刊载，在农场名噪一时。林彪事件对一代人的震撼是空前的，仅我而言，虽然青春的血依旧滚烫，可长期正统教育所建立起来的理想和信念几乎幻灭。其时，全国上山下乡运动中暴露的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城乡各地的方方面面，千家万户。知青们疑虑重重，人心浮动回城心切，在橄榄坝农场也一样，这样的“告全场知识青年书”其实于事无补。后来一批又一批父母有背景的知青都理所当然地回了城，风光一时的策划者也终于以革命的名义远走高飞了，留下的签名者一度受到同伴们的奚落，有被骗受辱的感觉，这也酝酿了日后知青返城风潮的掀起及其人心取向。

邓贤的《中国知青梦》中有个细节，说有位上海女知青在分场卫生所待产，不料因医疗条件差和医生的玩忽职守而惨死，此事在知青中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是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橄榄坝农场七分场，时间是1978年11月。^①死者名叫瞿林仙，是上海南汇新场镇去的知青，她的死引起了知青们的公愤，大家对长期被漠视的生存境遇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抬尸游行，队伍迅速扩大到几百人，并扬言要向西双版纳州府景洪进发。这使农场乃至州的领导们吃惊不小，有人曾企图用高压手段平息这场风波。可是西双版纳知青的回城风潮此时正以更加剧烈的方式席卷各处，橄榄坝也不例外。据说云南省委最后作出决定，要求立即采取措施，避免矛盾激化。指示：一、对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失职行为予以严厉的批评，责成他们向知青赔礼道歉。二、答应知青合理要求，为死者举行追悼会。三、通知死者家长和上海知青办，请他们来西双版纳共同料理后事。在省委的干预下，一场风波暂时平息了。但是版纳知青的回城风潮并没有因此平息，知青们联名公开信，游行罢工，北上请愿，一时震惊中央高层。这在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史——大潮》《中国知青口述史》和顾洪章、胡梦洲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大事记》以及王增如、李向东的《上山下乡：中国1968》中都有记载。

返城潮掀起时，我因母亲病重，正携妻儿在上海探亲，可是朋友们隔三差五地会寄信来，告诉我西双版纳人心惶惶满城风雨的种种情况，短短的一个月，收到的信多达十几封，信中描述了知青们泄愤罢工，跪哭求返，串联忙碌以及中央工作组被围被攻，农场各级领导束手无策无奈躲避等等。信看得我在家坐立不安忧虑万分。可惜那几年忙于安顿生活，信一封也没有保留下来。多年后我看叶辛的《孽债》，虽然小说的文学描写有可推敲之处，但大历史还是真实的，有的细节简直就是实录。记得书中写回城风潮时场面失控，象征权力的公章公然用绳索悬在过道上，任凭知青们在各种名目的证明材料上盖戳。这种闹剧在我们农场也真实地上演过。其实即使不悬章，那时盖章也一样混乱。当时我回沪的身份认定就一波三折。先是按实情写明我是农场干部，要求按照“顶替”政策回沪，可证明拿到上海，说干部身份不能顶替。其时我正在学校任教，于是又出具了教师的证明，也不行。最后干脆什么都不写，说是在农场当了十年工人，盖戳寄回，这才大事告成。结果回来后工资被减了三分之一，为此我还闹过情绪，这是后话。在上海，我岳母为了让我妻子“顶替”回来，好端端的人服了药去体检，造出病情提前了退休。因为我是已婚知青，只有双双顶替，才能回城。我兄弟下乡在黑龙江，只有父亲一个顶替名额，家里左右为难，迟疑不决。为此两家人由误会生出事端，好多年都能没平和。当年在知青中想假离婚也容易，出于现实考虑弄假成真也有。

^① 这个故事一直为知青题材的著述作为史料引用，可讹误甚多。笔者近期访谈了当事人即亡者当年的丈夫翁是仕贤以及亲历此事的知青朋友。真实情况简述如下：其一，1978年10月，丁惠民等的第一封“致邓小平的公开联名信”已经张贴在景洪街头，并为广大知青知晓。瞿意外死亡时，回城风潮已经风起云涌。说瞿之亡为版纳知青回城风潮的导火索，不够准确。在回城风潮的大背景下，瞿死亡事件为知青们提供了一个抗争命运而“借题发挥”的理由，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仅此而已。其二，知青们“借题发挥”抬尸游行，仅在橄榄坝农场场部一带，时间也不长，没有去景洪。参加者仅为七分场的部分上海知青，声势没有传说中的轰轰烈烈。而且，鉴于对亡妻的顾惜，翁本人是持异议的。其三，产妇从临产到亡故，翁作为丈夫一直陪护身边，没有所谓的在山上“农业学大寨”不回家。实际上产妇死亡的主要原因还是边疆医疗条件的落后，但医护人员的责任也很明显。这在当年的调查结论中都有记载。其四，并非母子双亡。其子现今已结婚，育有一女。1998年6月，他在父亲和继母的陪同下还专程去橄榄坝祭扫了生母。

至于医疗证明上，什么病管用尽可写上，那悬着的公章盖在各式各样的证明上，能使你在返城时左右逢源。有的知青急于回来，干脆办个退职手续了事，这在今天看来，不干了退职很正常，可那时是真正的破釜沉舟了。回到上海区区的退职费化完之后，就陷入了窘境，于是同命相怜的知青们就跑去上山下乡办公室诉求，感到无望时，有人还冲动地打砸过那儿的办公室。

我于 1979 年初回西双版纳办理一家三口回迁上海的手续时，回城风潮还没有过去，当时西双版纳通往昆明的公路上，一边是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军车隆隆南下，一边是堆满行李的各式车辆上拥坐着各地知青匆匆北上，沿途有序也混乱，车轮滚滚，尘土不绝，成了当年独特的景象。在农场，知青们各种回城的理由都已被认可了，正在忙乱地离开。被上山下乡闹腾了十年的农场，经历了回城风潮的大晃大荡之后，显得冷冷清清的毫无生气，如同一个疲惫之人，喘着粗气只想休息。

一个初春的下午我离开了橄榄坝，当车驶过曾经熟悉的村寨田野，胶林乡路时，望着公路下依然波涛汹涌的澜沧江，心情很茫然，不知是失落还是庆幸，是彷徨还是期待？正如有首歌唱的：天上有个太阳，水中有个月亮，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哪个更圆，哪个更亮……我不知道我属于谁？云南十年，有太多的故事沉淀在我的生命里，难以释怀。

【口述者简介】 沈志明，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 200235